

“汉学”与“国学”

张西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展开对域外汉学研究时,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处理好“汉学”和“国学”的关系。因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无论是域外的“汉学”还是国内的“国学”都是以“历史中国”为其研究对象的,即都是将研究锁定在中国的古典人文学科上的。这样,有些学者就认为,“汉学”和“国学”没有什么区别,二者是一样的,无非国外的汉学家们住在东京、巴黎、纽约而已,大家做的一回事。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无论汉学家还是汉学家,大家都是在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经典人文学科,但这样的认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域外的汉学家不仅身在中国以外,而且他们心也在国外,他们所从事的汉学研究有着自己国家的学术理念和学术规范;同时,当他们开始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各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从西方来说至少有400年的历史。他们有着自己国家的学术传统,这种学术传统是他们赖以生活的学术空间,是他们根本无法摆脱的。

如严绍缙所说,这些汉学家“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和我们中国本土很不相同。他们是以他们的文化为背景而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母体文化’的观念。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

‘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在之后不久的文章中,严先生对汉学(中国学)下了一个经典定义:汉学(中国学)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研究’的性质”。

对汉学(中国学)这样的定义就明确地把“汉学”和“国学”划开了界限,使其本质性的特点表现了出来,从而使我们对海外汉学(中国学)是和“国学”有着密切联系,但却完全不同的一门国外的学问。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中国上古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受到涂尔干社会学的影响,从而开创了宗教社会学研究之先河,对他这种宗教社会学方法论的吸取推动了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当年杨绛先生受教于马伯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采用宗教社会学方法的学者,而中国的宗教学界几乎没有人知道早在近一百年前马伯乐已经创立了这种方法,是这两年才开始注意的。今天宗教学界的学者们只不过是西方的宗教社会学搬来而已,他们今天也仍不知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中国传统的(诗经)研究中,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像马伯乐这样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路数。

——节选自张西平《西方汉学研究导论》(汉学研究2)

(整理:贾韵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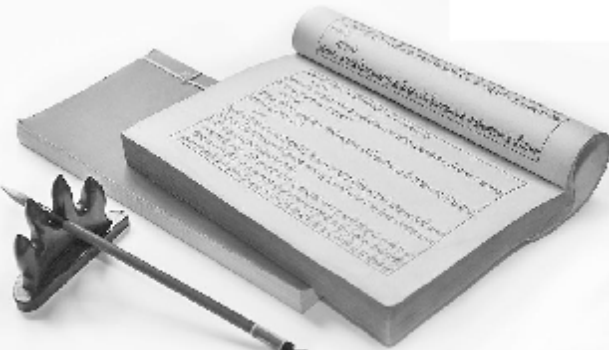
再谈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

温儒敏

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汉学心态”这个说法,引起某些议论。其实,我从来没有否定汉学的意思,我始终认为汉学很重要,而且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我想强调的是借鉴不是套用,那种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把汉学当作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的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提出警惕所谓“汉学心态”,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中空泛的学风,并非指向汉学。

汉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的动机,是离不开西方学术背景的。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那么我们的态度和海外汉学家并没有大不同,“身份”问题也会随之出现。所谓“汉学心态”,不一定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盲目的“逐新”。“汉学心态”就是蜂拥“跟进”,是学界的“追星”,是失去了自己的学术个性与自信的表现。许多“仿汉学”的文章,共同的毛病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汉学的套路并非不可借用,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要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克隆。

“汉学心态”与“仿汉学”在“泛文化研究”与“现代性”的过度阐释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比如把“现代性”的追求解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唯一基本主题;或是把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现代性”作为试金石,用于衡量和剪裁中国文学的丰富史实等。虽然不无新意,但也是先入为主,刻意“翻新”的表现。此类研究大而无边,是从概念到概念,无视文学创作的情感、想象、审美个性等问题。在某些“后现代”的论作中,文学性更是被放逐,文本分析只是作为社会变迁、文化冲突的例证,文学变成可以任意按社会心理学理论拆解的冷冰冰的死物,变成支持都市文化、公共空间、民



族认同、性别政治等问题阐释的材料。这类“仿汉学”研究并未真正提升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

“泛文化研究”中的“借喻式解读”,也是“仿汉学”文章中常见的路子。西方汉学家在文化研究方面不无成功,这种研究思路传入中国之后,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疆域,也增添了研究的活力。但是在某些模仿海外汉学路数的文章中,讨论文化研究问题时总是很空泛,好像不是中国学者在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而像是大洋彼岸的汉学家在遥看中国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为了理论“炫耀”,或重在“可操作性”,结果就会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这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远离文学本身。

总之,我们要尊重汉学,引进汉学,研究汉学,但不宜把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我们可以借鉴外来的学问,但是问题的发现、建构和对方法的选择,应该建立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

——节选自《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会议论文摘要》

汉学历史与学术形态

阎纯德

究竟什么是SINOLOGY(汉学)?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二百多年来国际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的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即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le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成了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

广阔的内涵,绝对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和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形成相互兼容并包的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涵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从历史上看,尽管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SINOLOGY最好,因为SINOLOGY不仅继承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CHINESE STUDIES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国际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节选自阎纯德《汉学历史与学术形态——列国汉学史书系·序二》,《汉学研究》第十集

(整理:朱彩婷 张思远)

架设东西方的心灵之桥

方维规 ——荣格、卫礼贤与《太乙金华宗旨》

德国著名来华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首次将道教内丹学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语,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为这部欧洲人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典籍撰写了长篇评述《欧洲的评论》。二人将合作出版的这部中国典籍取名为《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发表于1929年。1931年,贝恩斯(Cary F. Baynes)在荣格的指导下,将这部道教养生奇书的德译本译成英文。

《金华秘旨》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一版再版,历史悠久,在西方有重大影响,并成为西方认识东方唯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卫礼贤翻译并注释的《金华秘旨》具有开创性意义,使这本书名闻天下;荣格则为该书写下了他一生中论述东方思想的最系统、篇幅最长的文字,并明确指出:“我的这篇评论的目的是试图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的确,这部译著为道教内丹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卫礼贤如何引进西方心理学概念“意识”和“无意识”来阐释内丹学中的生命根芽“识神”和“元神”,荣格如何用集体无意识理论来理解《金华秘旨》所说的超越现象,都不是本报告的重点。报告人主要关注的是《金华秘旨》得到卫礼贤和荣格青睐的学术背景亦即个人因素,以及他们所传播的异质文化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的思想背景和心理基础。

潜心于集体无意识研究的荣格,曾长期为找不到佐证而苦恼。卫礼贤译稿不但适逢其时,而且也成为荣格学术“转型”和“重构”的要素之一。他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找到了评论《金华秘旨》的路径。荣格赞誉道家和内丹学,固然与他本人的学术追求和心理治疗实践直接有关,但是,他和卫礼贤首先是把《金华秘旨》当做生活哲学

来阅读的。这里研究的关键在于,他把该著作排除在“玄学”之外,赋予了心理学内涵,并在心理学的框架中讨论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热”在整个欧洲精神生活中再度掀起。德国的凯瑟林伯爵(Graf 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便是这一思潮中的焦点人物,这位“精神界的唐吉珂德”在其著名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1918-1919)和其他著述中,坚信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能够给人类尤其是西方带来精神复兴。1920年,他在达姆施塔特市创立了“智慧学派”(Schule der Weisheit),试图以此产生更大的、持久的影响。“智慧学派”名士云集,而荣格和卫礼贤就在其中。

荣格借鉴和吸收中国思想最直接的来源是他同“智慧学派”的交往,尤其是凯瑟林和卫礼贤的著述对他影响深刻。凯瑟林周围“智慧学派”的学者,几乎都狂热地在智慧学说中寻找他们行为的深层原因、生命支柱和终极意义以及世界文化的综合。把西方的“技能文化”与中国的“人本文化”进行两极化对比,是“智慧学派”最著名的论说。

荣格和卫礼贤所看到的是中国精神的原发性,中国思维的人本性和本真性。战后的欧洲人渴望外界与心灵的真正和谐,无疑是对“疲于奔命”的彻底否定。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中国的“人本文化”和生活哲学几乎是拯救欧洲的灵丹妙药。荣格说:“我们已经着手建立一门心理学亦即一种科学,它会给我们一把钥匙,解读东方仅仅借助非正常心灵状态已经发现的事物。”所谓“非正常心灵状态”,就是把心念集中于最深层的“光”(“金华”),从而使从外部和心灵的一切纠缠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解放”的感觉。

——节选自《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会议论文摘要》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

孙郁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在日本影响较大,其著作只有《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与《北京苦庵庵记》译成了中文。他的文本与一般日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愿意从悖论的人生经验中考察中日文学的内在紧张度,而他颇有玄学之力的内省,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少有的存在。

在许多文章里,木山出语不凡,颠覆常识。比如他说在政治理念与审美意识间,鲁迅保持了良好的抽象概念与野性思维。这是把握了核心的诊断,也解决了鲁迅认识中理性力量与审判力量并重的矛盾。中国的一般作家一旦嗜上理论,就损害了文艺,鲁迅却兼而得之。他的文本常常在是而不是、不是而是中展开自己的主题,诸多苦难在其笔下纷纷崩解。如此深深地捕捉鲁迅挫折里的坚毅的东西,大概与木山的日本经验有关。二战之后,日本知识界意识到自己前人的失败之处就在于过于相信自己的确定性,以为掌握了真理。鲁迅的敢于承担失败又超越失败的选择,昭示了一种精神自塑的可能性。

使木山英雄念念不忘并为之激动的是鲁迅的《野草》。他知道那是个超逻辑的世界,自己也无法以什么理论体系来说明其原貌。木山英雄在此看到了鲁迅思想里本然的存在,自己是虚无的,却又不安于虚无。活着不是为了亲人,而是为了让敌人感到不适,让其知道世界的有限,虽然自己也希望速朽。鲁迅世界纠缠的是无法理喻的存在。五四文人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都是闪着光彩的存在,胡适、陈独秀也是以新人的面目出现在文坛上的。而鲁迅独自在暗影里,与旧的存在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越憎恶过去,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旧的存在,必然要消失在时光中,于是自觉地去打开黑暗的闸门,解放那些囚禁在牢笼里的人。有趣的是被放到光明处的人,却在诅咒、杀戮开启闸门的殉道者。木山英雄感到了鲁迅在保守与进化间的非



凡的目光。旧物未去,新物亦污。女娲以伟岸之美却造出了萎缩的人类,《颓败线的颤动》的老母以残破之躯孕育了家人,却未料遭到了子女的道德戕害。木山英雄意识到,鲁迅的认知哲学除了尼采式的决然外,还拥有自己特有的东西。自我与他人都被负罪感所缠绕,于是只能陷于苦难的大洋。解放的路径从心灵里开启,可是彼此隔膜的世界哪里是通道呢?他对鲁迅的回旋式语言的发现是在六十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学者尚无深思于此者。八十年代后中国学者的兴奋点,有的就是从木山那里获得的启示。

作为逆俗的研究者,木山英雄续写了东亚“被近代化”的困顿。中国文学经他的笔,获得了超越国界的思想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借他人而照自我,某些不明晰的存在终于获得了新奇的透视。只有在“他人的自我”里,才可能相逢到真的“自我”。跨国文学研究的魅力,大约与此有关。

——节选自《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会议论文摘要》

世界汉学大会 2009 回顾与总结

■ 周爽

2009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如期举行。世界汉学大会由孔子学院总部暨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所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学院共同承办,定期两年一届。大会希望通过为期三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促进国际间汉学的研究和交流,推动世界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搭建一个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交流平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前任校长纪宝成、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贺信,向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来宾致以诚挚问候,展望了汉学领域的发展前景和日益深远的影响力,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前任校长纪宝成、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鲁惟一共同为“国际青年汉学家研修基地”揭牌。

此次汉学大会以“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主题,并就六个分论题依次展开讨论,分别为:“汉学与文化对话”、“汉学与历史研究”、“汉学与中国文学”、“汉学与汉籍传译”、“汉学与中国戏曲”、“孔子学院论坛”。本次会议为期三天,10月30日至10月

31日两天举行了全体会议以及六个分论题讨论,并在10月31日下午和11月1日分别举行了“出土文献与汉学研究”、“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两场圆桌会议。

大会迎来了70多位海外学者及110余位国内知名学者。其中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沃德(Graham Ward),俄罗斯科学院的伊里娜·波波娃(Popova Irina),罗曼诺夫(Lomanov Alexander),英国剑桥大学的鲁惟一(Loewe Michael),瑞典的罗多弼(Loden Torbjorn),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孔汉思(Küng Hans),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河野贵美子(Kono Kimiko),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霍普金斯(Hopkins Dwight)等。另外,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乐黛云教授,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肖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戴逸教授、杨慧林教授、孙郁教授,耿幼壮教授,王家新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郭汉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叶舒宪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詹福瑞馆长,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馆长等也出席了大会。

为了契合这次大会的主题——“汉学与跨文化交流”,彰显《周易》和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两句名言“同归而殊途”和“此路亦彼路”,各国学者挥斥方遒,求同存异,谈笑间切磋着学术研究,碰撞中闪烁着智慧光芒。有关于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离合的

深层思考,有外国译者从送礼层面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察,有中外学者对儒教信仰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和谐世界的展望,更有对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背景下汉学传播方式的研究……来自不同文化圈、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专家学者在这样一个自由宽容的平台上畅所欲言,发表着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同时,大会也收到了论文百余篇,有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卡萨齐和法国学者罗莎丽莎的《十八、十九世纪西文字典编辑史》),有对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如美国学者鲍玉行的《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前汉阶段》),有对文学作品国外译文的研究(如韩国学者金惠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在韩国》),还有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刘间文俊的《无力的呐喊——如何定位巴金的〈憩园〉》)。这些观点独到、思想开阔的论文,体现了当今世界汉学研究领域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盛况。

聚焦汉学,从最初西视角下的对中国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思想、语言的研究,到当今以国际化眼光对整个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审视,“汉学”这个蕴含悠久历史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概念,其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广博,其展现的文化包容性也越来越强大,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近些年

来,“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的建立引发了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潮,而金融危机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神引领也让世界对汉学更加关注。汉学研究领域的生机勃勃,无疑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力渐强、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密切联系。中国以日益成熟的大国姿态迎接世界各地的学者,洗耳倾听来自不同文化的声音与诉求。跨文化交流本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不同思想声音在共聚一堂的文化盛会中得到交流与碰撞,即是对自身的研究,不同的视角也会得到新的解读和理解。正如前任校长纪宝成在开幕辞中所言,“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交流,恰恰需要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和胸襟。所谓的‘跨文化交流’,正是要跨越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美学诉求、族群身份的差异,只有这样,才有文化带给人类的开阔和雍容……无论是沂水之畔的咏而归、称颂爱神的会饮畅言,还是今日少长咸集的世界汉学大会,我们一直追索和谈论的秘密,唯心灵和宇宙二者而已。价值、秩序、道德、真实、美,无不蕴藏于此。路漫漫其修远兮,共同的目标为我们跨文化的上下求索提供了共同的基础。”

迄今为止,世界汉学大会已成功举办过两届。回首2007年的“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和2009年的“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热烈的学术讨论仍历历在目,睿智犀利的交融启迪尚在耳畔。而在今年,金秋凉爽的11月份,我们也将迎来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汉学与当今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再次勇当东道主,以更加广阔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姿态,盛邀寰宇学者宾客齐聚一堂。

好好干啊,干完了就请你们去鲁迅、郭沫若博物馆玩啊!”院长的话让在场所有的宣传组志愿者们感受到一种苦中作乐的充实,社员们立刻打起精神投入到报纸的制作中。

而谈到第二次汉学大会的志愿经历,刘心悦也分享了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感悟。首先,由于上次汉学大会是文学院承办的,因而文学院全体师生都怀有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尤其是当看到人手一份彩版的《中文新世纪》时,刘心悦等制作报纸的志愿者们心中的成就感和喜悦是无法比拟的。其次,这次的志愿经历让她更加了解了汉学以及汉学大会,领略到汉学的魅力;在接触各国汉学家的过程中,了解其研究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更是开阔了学术眼界。

当被问及最大的收获时,刘心悦选择用“新鲜”和“坚持”总结了三年前的志愿经历。最初是新鲜和好奇激发了一个年轻而热爱文学的心,但当新鲜褪去,疲惫袭来时,那份坚持和执着支撑着她走到了最后,而在不断的追求完美的路上,报纸也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唤醒、自我成熟的过程,在探索文学的道路上,尤显可贵。同时,她认为,通过这次在后方制作报纸的工作经历,她学到了很多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是课堂之外一次汲取知识的好机会,因而对每一个文学院的学生更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视角读汉学

“汉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汉学大会举办之前,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纳闷而好奇,刘心悦同学在大会之初也有过同样的感受。而正是这一由我举办的、汇集全世界大批汉学

“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大学生活一开始便有机会参与到这种国际顶尖水平的高峰学术论坛中去,我自认为非常幸运。”王阳同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09级本科生,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召开时,刚刚迈进大学校园的他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志愿者。

王阳同学说,第二次世界汉学大会向他展示了何为“大学之大”。与会学者均为国内外大师级人物,汉学大会为这些一流的汉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与会期间,他们发表自己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某一议题发表演说,圆桌会议上,他们就某一主题互相讨论,激烈交锋,思想的碰撞往往会给学者们带来新的灵感。坐在会场之外聆听他们的交谈,王同学说他能感到智慧在空中流动,当时作为一名大一新生,便能体验到如此浓厚的学术环境,他感到十分的幸运,从此也对汉学学术研究有了切身的感受。

身为记者团的一员,由于采访需要,王阳同学跟随迎送组的志愿者们一起,到机场去迎接海外汉学家的到来并进行采访。那一次,他需要采访的是来自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神学教授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教授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并娶了一名中国妻子。王同学说:“霍普金斯教授完全没有架子,他知道我是文学院的学生,便非常和善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由于长期研究中国文化,教授的理解能力很高,凭我的英文

水平完全可以与他无障碍地交流。”大师在学术之外的生活也充满了一个个温馨的故事。当时霍普金斯教授非常想多拿一件汉学大会的纪念衫,他就找到王同学,拜托他去帮忙再找一件。王阳同学说,虽然再去寻找一件型号合适的纪念衫非常困难,但是最终看到教授拿着自己为他找来的纪念衫离开中国时,他心里还是充满温暖。

当被问及参加汉学大会最大的感受时,王阳同学说:“不是辛苦,而是自豪。”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承办这样顶尖的汉学研究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文学院乃至整个学校的学术声望和国际地位,这是非常值得自豪的。对于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王阳同学认为,这是所有在校生成感受浓郁学术氛围的绝佳机会,它会让你对汉学、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崭新的认识。有了前两届的经验,这次的汉学大会一定会更加成功。

汉学大会·我的大一

孙敬一

专访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志愿者王阳

刘心悦同学在2009年世界汉学大会结束后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称之为“三天三夜”。这三个几乎没有挨过床的日子,在她心里既甜又酸,其中滋味最终都铭刻着成长的深意。

2009年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当时大二的同学参加了宣传组的志愿者活动,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马不停蹄地赶制出了三份有关汉学大会的《中文新世纪》特刊,向所有与会人员展示了汉学大会的独特风貌,更让文学院媒体总社《中文新世纪》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人大人的心里。

三天三夜 成长记

■ 袁满芳

于2009年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盛况,现在大多数在读的文学院本科生无缘得见。睽别三年,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和亲身参加过上届大会的刘心悦同学取得了联系。身为研究生的她,依旧热衷文学,依旧心系文学院。采访中,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在为期三天的汉学大会中一路收获的故事……

无心插柳柳成荫

许多故事的开头都源于意外,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精彩。就像刘心悦进入汉学大会志愿者的校内宣传组,不是因为主动报名,而是在紧急情况下的“空降”,她所背负的压力和紧张也是不言而喻。每天一期的报纸,从速度到质量都不容轻视。从写稿校对、排版印刷到最终发行,这无疑是在与时间赛跑,也是对潜能的极致挖掘。值得一

提的是,在汉学大会的催生下,文学院媒体总社正式成立了记者团,刘心悦同学有幸加入向记者团的第一批领军人物中。不负众望,新生的记者团在第二届汉学大会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于本届的汉学大会,刘心悦同学也真诚地希望记者团能够薪火相传,再创佳绩,奉献出更多有价值的文字。

回忆起当时紧张的工作状况,刘心悦不禁感慨万千。为了保证特刊的质量以及记者团的工作效率,媒体总社精心挑选了部分大二成员参与特刊的制作。同时由于宣传组一些志愿者被调至其他组工作,因此真正参与报纸工作的人数极其有限,总共不到10同学要负责报纸的四个版面,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为了保证报纸的及时印刷出版,他们必须当天就将所有的会议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字稿,有时还要写专题报道以及评论性的文章,加之最终校对、排版,宣传组成员基本都没有时间回宿舍睡觉,只能在疲倦之时在沙发上稍稍休息。“一张简陋的

沙发凳,上面铺着一件军大衣,这就是当时所有人的临时床铺”,刘心悦同学无不感慨地说。

三天里,真正的煎熬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内心的焦虑。刘心悦说道,因为报纸必须当天赶出来拿去印刷,所以稿件必须尽快写完并完成校对、排版,否则第二天就无法及时出报。她向我们回顾了自的经历:一次,她拿到一份学者发言稿,内容非常有攻击性,在当天的会场上即引起过轰动,而她被要求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措辞合适的三千字评论稿。在心急如焚和毫无头绪的重压下,她竭尽全力爆发了所有潜能,最终在规定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如今这段经历回忆起来,愈加意味深长而铭记于心。

入行始知情意深

提及这三天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刘心悦同学讲述了孙郁院长于寒天中前来探望他们的场景。由于空调供暖不足,当所有人都感到冷倦交加之时,院长的到来给大家无限的力量。在环视一周之后,孙郁院长深切地感受到大家的不易,笑着鼓励道:“大家

研究专家的,规模宏大的学术会议,让文学院学子乃至很多的人大人对“汉学”以及汉学大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对于汉学,刘心悦同学讲到,在阅读了许多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之后,她发现汉学其实是一种视角。“我们看自己,是研究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而西方人则是从一个‘他者’的视角去看,就像我们研究汉学一样。这提供给我们更多他者文化的视角,帮助我们从不侧面理解自己的文化。比如说,一个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强调清代西方传教士的作用,而本土的研究就很可能忽略它。这种来自他者的研究角度,会帮助我们去正视外国人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我们自身很多时候所看到的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自己的文化,但外国人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不同方面解读文化的视角,开阔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维。”她以日本文化的研究为例,提到了我们自身正视本土文化的局限性,并强调大家在看待文化现象时,会不自觉地带上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而做学术研究时,我们需要以第三者冷静的视角,正视他者文化。

当采访接近尾声时,我们谈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在对待汉学的态度上的差异。刘心悦同学认为,在西方人已经研究汉学几十年之后,中国人才开始承认汉学,并且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汉学仍然不是十分了解,这都需要通过加大普及教育来逐渐改变的。

经验寄予后来人

对于即将参加本次汉学大会的志愿者们,刘心悦同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期望。她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都要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让自己完成成长的蜕变。“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短,却足够你开阔眼界,增长才干,形成独特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关键是要抓住每一个能提升自我的机会,去主动吸收那些能丰富自己内心的东西。除此之外,一定要坚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投入无尽的热情。不要害怕困难,那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部分,若干年后,当你回想起从前的努力和付出,会发现当时的困难和磨练如今竟是如此的甜蜜。”

这是一位曾为汉学大会付出过心血,挥洒过激情、倾注过思考的老志愿者对新志愿者们最真挚的鼓励。而对于如期将至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马丁·雅克 (Jacques Martin), 伦敦经济学院 LSE 亚洲研究中心 IDEAS 的高级客座研究员, 英国智库德莫斯 (Demos) 的创办人之一。1945年, 他生于英国考文垂, 以一等荣誉学士学位的成绩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 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之后在布里斯托大学经济与社会史系担任讲师。他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立命馆大学访问教授, 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另外, 马丁·雅克还担任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 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 并曾为 BBC 撰写和主持过多次电视节目。

他曾参与合编、合著《劳动向前迈出的步伐停住了吗?》(1981)、《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和《新时代》(1989)。在其代表作《中

国统治世界时, 西方世界的没落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中, 马丁·雅克以深邃的目光透视了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根本异同。他强调, 21世纪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纪, 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迅速兴起, 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充满“现代竞争性”的新时代里, 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核心角色。



中外与会学者介绍

陈众议,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1977年入复旦大学, 1978年被选派留学, 先后就读于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研究生部。1982年回国, 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87年获墨西哥国家奖学金并被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同时录取为博士研究生。1999年应邀在西班牙康普鲁坦塞大学和马德里自治大学访学。

他先后发表专著六部, 论文

数十篇。其中专著《魔幻现实主义大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青年成果奖, 论文《魔幻现实主义与印第安文化》获中央国家机关首届优秀青年论文奖, 论文《科塔萨尔》获第十四届香港青年文学奖。他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等职, 发表专著《拉美当代小说流派》(青年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八五”社科基金项目)、《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等。同时承担国家重大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史》(西班牙语文学)”的写作。业余时间他还从事文学创作, 计有长篇小说《玻璃之死》、《风醉月迷》等。目前他正主持《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的编撰工作。

亚历山大·卢金 (Lukin Alexander),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东亚和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俄罗斯委员会委员。

卢金教授于1984年毕业于苏联外交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1984年至1985年在中国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曾就职于苏联外交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0年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 任跨地区关系小组委员会主任。1997年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博士学位, 2007年获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研究院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1999年至2007年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2000年至2006年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欧亚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卢金还是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问题》杂志的编委成员, 黑龙江省社科院名誉研究员, 莫斯科州州长对外经济关系问题顾问, 并曾于2005年至2008年担任《俄罗斯-中国21世纪》杂志主编。

卢金教授主要著作有《三次中国旅游》、《无知反对不公: 俄罗斯民主人士政治文化》、《俄国熊看中国龙: 17-21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等。他在俄文、英文和中文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俄罗斯政治局势、东亚国家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文章。2009年胡锦涛主席授予卢金“中俄关系六十年杰出贡献奖”, 以表彰他为发展中俄关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冯珠娣 (Farquhar Judith),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教授,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曾任美国文化人类学会主席、美国温纳-格伦 (Wenner-Gren) 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评审委员会委员, 现任《医药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形势: 东亚文化评论》(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等 SSCI 学术期刊编委会成员。

冯珠娣是中国传统医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 同时关注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她从多方面进行人类学的研究, 包括医学人类学、知识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和身体、体验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embodiment), 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 以及关于阅读、写作、翻译的理论研究。

她的著作主要有《认识实践: 遭遇中医临床》(1994)、《饕餮之欲: 当代中国的食与色》(2002)、《万事万物, 当代北京的品质生活》(2012) 等。她在代表作《饕餮之欲: 当代中国的食与色》(Appetites: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中, 以大文化散文的笔法, 对几代中国人的饮食方式进行了细心的梳理, 同时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 对当代中国生活进行了全方位地解读。冯珠娣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 审视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 挑战了“食色, 性也”的论断, 揭示了“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她的解读不仅涉及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 同时也涵盖了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欧凯 (Okay Bulent), 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语言学院教授、汉学系系主任、国际科学和文化研究会会长。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化、音乐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故事》(1987)、《孔子》(2004)、《使用汉语》(2008-2012) 和《汉字》(2012) 等。

欧凯教授为促进汉语事业在土耳其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于2011年1月9日参加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召开的首届安卡拉市汉语教师座谈会, 并在会议中简要回顾了自己30年艰难的汉语教学历程, 与教师们共同分享了他的汉语教学经验 and 体会。2012年5月24日, 欧凯教授出席了安卡拉大学汉语系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共同举办的“中国文化日”活动开幕式, 以庆祝2012土耳其“中国文化年”。

在土耳其的汉学研究问题上, 欧凯教授认为土耳其和中国之间存在互相映照的历史关系, 若抛开土耳其文化, 便很难完整说明中国的时代变迁; 而若没有中国作为参照, 学者们也无法全面研究土耳其历史。



代田智明 (Shirota Tomoharu),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他的主要著作有《解读鲁迅之谜与其十篇不可思议的小说》、《通过毁灭自我来毁灭丑恶——深层探究竹内好的鲁迅论》和《日本近代批评与鲁迅》等。

在他的代表性著作《论竹内好: 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中, 代田智明教授回顾了竹内好的鲁迅研究, 总结了竹内好在西方文化侵入东方的背景下, 坚持“改革的契机常常存在于‘内部’文化”的思想。即要在东方文化内部进行改革才会找到东方文化发展的新途, 强调“只有在恶中才能寻找到制服恶的契机”。同时, 代田智明还提出在竹内好多种思想的背后实则隐含着一个焦点, 当映射到不同研究领域时即会散发出独特的思想光芒。在一系列对竹内好思想的解说后, 代田智明强调“在现代的时代思考竹内好的思想、态度和方法 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阿克曼 (Ackermann Michael), 著名汉学家, 他青年时期曾于慕尼黑大学学习社会学, 后来转向中国古代语言学方向。

阿克曼先生三十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1975年, 作为最先来到中国的国外留学生之一, 他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语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现代历史。1988年, 阿克曼创建歌德学院, 担任院长直至1994年。1995年调任歌德学院莫斯科分院院长, 而后转赴



罗马尼亚分院院长。2006年他再次返回中国, 任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认为歌德学院已经成功铺设了通向东方的桥梁, “现在中国的大门已经敞开, 德中人民互相自由来往, 互联网也使世界成了地球村, 所以如今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为中德两国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提供一个文化思想交流和共同创作的平台。”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 阿克曼曾翻译过老舍、张洁等作家的作品, 其中张洁《沉重的翅膀》德译本曾引起巨大反响。他的散文集《中国: 门里门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私人旅行经验中的社会人群肖像》更是一版再版的畅销书。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现任亚非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张西平于1994年至1996年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作访问学者, 期间先后在波恩大学汉学系、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马堡大学汉学系等多所高校的汉学系做学术报告。1998年应邀参加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和南怀仁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南怀仁国际研讨会”; 2000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参加中国和葡萄牙科学技术史讨论会; 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做学术访问, 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意大利梵蒂冈图书馆作访问学者; 2002年至2004年先后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德国纽伦堡-爱兰根大学做了近3个月的学术访问; 2004年至2006年先后作

KAAD 基金会访问学者、罗马大学访问学者和德国埃兰根大学访问学者; 2007年再次作罗马大学东方学院访问学者; 2008年再次作德国埃兰根大学访问学者。

张西平的代表著作有《历史哲学的重建》、《中国和欧洲宗教与哲学交流史》、《西方早期对汉语学习调查》等。他曾主编《国际汉学》、《国外汉学教学动态与研究》、《中外哲学交流史》、《本色之探: 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和《传教士汉学研究》等。目前, 他主要从事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等研究。



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 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 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并赴美留学, 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 之后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 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 并于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社长至今。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 杜维明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开拓了“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和“儒学第三期”等诸多领域, 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杜维明的主要著作有《行动中的新儒家思想——青年王阳明》、《“中”与“庸”——儒家的宗教性》、《仁与修身》、《儒家思想: 以创造性转化为自我认同》和《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等, 国内曾出版五卷本《杜维明文集》(2001)。



谢大卫

(Jeffrey David), 加拿大人, 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教务长及文学与人文科教授。曾在加拿大、美国及英国多所大学任教或任客座教授。从1996年起, 他担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并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一直致力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2003年获得现代语言学会 (MLA) 授予的终身成就奖。

谢大卫教授是中世纪研究、《圣经》和文学跨学科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 当代西方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撰写和主编了十余部著作, 其中包括在宗教与文学跨学科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词典》(1992), 以及获得多种学术奖项的《圣书的子民: 基督教的特质和文本传统》。该书从西方宗教、文学、历史、哲学、绘画诸方面论证了《圣经》在西方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和持续的影响力, 批判了当代文论对基督教文本理论的歪曲。他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 提出了自己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见解, 是西方文学、文化和基督教跨学科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著作。书中援引书籍数百种, 涉及中古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等文本, 显示出作者惊人的博学和对西方文化深刻的洞见。

